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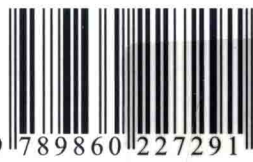
海洋文化論集

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

主 編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

- 
- 主 編：劉石吉 王儀君 林慶勳
 - 出 版 者：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文學院
 - 地 址：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 電 話：(07)5252000 轉 3241
 - 發行日期：99年5月



9 789860 227291

定價◎NT300元

海洋文化論集

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

主 編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海洋文化論集 / 劉石吉, 王儀君, 林慶勳主編.

— 高雄市 : 中山大學人社科學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文學院, 民99.05

368面; 16×23 公分

含索引

ISBN 978-986-02-2729-1(平裝)

1. 航運史 2. 貿易港 3. 文化 4. 文集 5. 中國

557.4607

99004069

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海洋文化論集 *Perspectives on Maritime Culture*

發行人 王儀君

主編 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

編輯助理 李思嫻

出版者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地址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電話 (07)5252000 轉 3241

傳真 (07)5250818

網址 <http://humanitiescenter.nsysu.edu.tw/>

發行日期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定價 新台幣 300 元

展售處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

印刷 正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986-02-2729-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言

海洋與水域是大自然中生命的泉源，然而從人類知道利用海洋之時，不僅孕育出賴以為生的方法，也發展出船舶製造與航行的技術，從近海至遠洋的交通與商業因此開展，同時也掀起了海上霸權與海域的爭奪。大航海時代以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拉近，鄭和可以跨國遠行，鄭成功得以渡海來台，而歐陸國家甚至更橫越遼闊大洋抵達美洲與亞洲，進而造就了歷史上無數的海域掠奪和族群融合與抗爭的事蹟。世界上有無數以海立國的國家創造了新的文化氛圍，許多海洋都市的發展也激發了國際通商與政治運作的可能，因此海洋事務的實際性不容忽視，而海洋文化與歷史的發展已形成人類共同的記憶，也反映出歷史上單一國家、政治實體、個人夢想與實踐。

據此，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於 2008 年 6 月成立了海洋文化專題研究群組，以海洋為研究的核心，再從各研究員本身專長的領域向外延伸發展，進一步探討海洋文化、海洋貿易史、海洋發展史等相關議題。未來，本中心更將配合本校泛海洋領域跨院合作計畫，展開跨越人文、工商、社會等領域的泛海洋研究，並舉辦學術討論會，使學者間能彼此分享其研究成果。

《海洋文化論集》即是本群組秉持上述信念，匯集了劉石吉、鄭永常、林慶勳、陳信雄、王儀君、陳宗仁、吳惠芳、江政寬、廖宏昌、范錦明、謝玉玲等知名學者的論文，期能藉由本書的出版，與讀者分享這些研究成果。本中心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劉石吉教授與本校中國文學系林慶勳教授、本中心主任王儀君教授擔任本書主編，另外還要感謝編輯助理李思嫻，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楊宗霖和張素鈴、楊采陵等人協助本書的校對。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謹啟

海洋人文・人文海洋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王儀君

人類是流動、移居的個體，而海洋則是孕育生命的泉源。從兩、三千年前起，人類便開始利用陸路及海路往四面八方流動，早期的移動方式以陸路為主，在中國唐代達到鼎盛，所謂的絲綢之路便由此而生，不但帶動了疆域、政治與商業上的發展，更促進東西文化的交流與族群的融合。

另一方面，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海上絲綢之路亦逐漸開展，沿海城市發展成港市，也使國家當權者開始發現並重視其在經濟、戰略上的地位。十五世紀以來，歐洲各國基於對財富與榮耀的追求，以及對神祕東方大陸的探索慾望，紛紛派遣船隊進入遼闊的海洋，開啟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掀起海上霸權的爭奪戰，並促使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意識、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直到廿一世紀的今天，海洋的重要性未減反增，對於以海立國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臺灣是個典型的海島國家，擁有豐厚的海洋資源，因此如何充實並發展多元豐富的海洋自覺與海洋文化，是我們亟需努力的重要議題。

世界上發展海洋文化及歷史研究的國家首推英國與美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及義大利也有專門研究海洋歷史與文化的學者。舉例來說，地中海周圍的海港、北歐的遠洋漁業，以及歷史上著名的海戰，都曾經是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單就 2010 年舉辦的重要研討會，便有哈德遜海洋史研討會、英國南亞研究年會、十七世紀戰爭與海洋治理研討會、地中海海洋史研討會*等。著名的海洋研究期刊也為數眾多，有的集中在海洋科技的發展與海洋貿易的連結，有的則偏向以流動的人群與海洋的媒介作為探討目標。《海洋歷史研究期刊》(*Research in Maritime History*) 就曾討論過包括航運、港口、海岸管理、海洋艦艇的發展、非洲人民

的離散，以及非洲船員對航海的政治與社會影響等議題。另外，英國文化部最近正展出海軍將領兼航海家約翰·納伯勒爵士（Sir John Narbrough）的航海日誌，英國政府與民間單位亦合作打造了德萊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所使用的金鹿號，並供民眾參觀。以上訊息均顯現英國對於發展海洋文化與歷史研究的重視。

事實上，在大航海時代的海上探險不只代表主權的伸張，也意味著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以海立國的英國，海軍將領、探險家以及對海戰有功的人員都備受尊崇。歐美的海洋文學一向不是個陌生的名稱，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曾於 1998 年舉辦海洋與文藝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近十年來，海洋文學研究、後殖民文學及海洋生態文學研究更是密不可分，Eric Williams 所著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1492-1969*，Marcus Rediker 的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 Pirate, and the Anglo-American Maritime World, 1700-1750*，以及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都是經典著作。

臺灣以海立國，是以海洋與臺灣人民有著共榮共生的密切關係。國內對海洋的研究，早期著重於海洋工程、海洋生態環境，以及海洋資源等領域。近年來，由於對南島語言的研究日深，我們因而能從其分布情況，得知一項驚人的事實——南島民族竟能藉由其智慧與有限的造船技術，將足跡跨海延伸至其他島嶼。國內致力於海洋歷史文化研究最著名的學術機構是中央研究院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該中心體制內從事海洋歷史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有張彬村教授、劉石吉教授、朱德蘭教授、曹永和教授、陳國棟教授、李東華教授等。過去廿年來，該研究團隊已出版《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共計十輯，並舉辦相關研討會，國外學者如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倫敦政經學院鄧鋼（Kent G. Deng）教授，以及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均曾參與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研討會。其他研究海洋歷史文化與中西文化交通的著名學者包括蔡石山教授、黃一農院士、陳信雄教授、李

弘祺教授、張力教授等。他們的著作如 *Maritime Taiwan: Histor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蔡石山)、“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aritime Silk Road” (李弘祺)、《東亞海域一千年》(陳國棟)、〈海洋史研究的現代意義〉(張彬村)、〈傳統城市與通商口岸：特徵、轉型與比較〉(劉石吉)、《中國海洋史論集》(曹永和)等，都引起學術界極大的迴響。近年來由於科技的開展，結合海底探勘技術與考古學已經受到學界的重視，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院已與中央研究院的臧振華教授成立了海下考古研究團隊，其他專精於海洋考古的學者另有劉益昌、李匡悌等人。

不斷地移居與遷徙是人類求生的本能，因此歷史上的唐山過臺灣、大西洋奴隸貿易，以及海港城市的興衰等，業已成為全人類共同記憶的一部分。然而，這份本能除了促使海上航運的發達，帶來文化的發展之外，也同時伴隨著物欲與權力欲的擴張，因此隨著廿一世紀的到來，海洋與氣候變遷及海洋與生態已成為炙手可熱的課題。

海洋歷史文化研究是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專題研究的主軸之一，這部《海洋文化論集》共收錄海洋歷史與文化相關論文共 13 篇，所探討的面向有〈消失的國界：德萊克與前現代時期的海洋政治符碼〉、〈長崎唐話教本及其反映的唐人庶民生活：以唐人與唐三寺互動為對象〉、〈日南與交趾：五世紀前中國第一個國際貿易港市〉、〈從青龍鎮、十六鋪到小洋山：上海港埠沿革發展史略〉等等，期能藉由這些研究論文的出版，連結其他學術社群，達到學術交流與分享的目的。

2010 年 3 月 25 日於國立中山大學

*請參閱英國歷史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研討會公告 <http://www.history.ac.uk/events/category/31>

目次

序言	i
【海洋人文・人文海洋】 王儀君	ii
王儀君 消失的國界： 德萊克與前現代時期的海洋政治符碼	001
林慶勳 長崎唐話教本及其反映的唐人庶民生活： 以唐人與唐三寺互動為對象	019
江政寬 徐福東渡：歷史傳說的探討	043
廖宏昌 神仙・帝王・海：秦漢帝王入海求仙之風潮	071
鄭永常 日南與交趾：五世紀前中國第一個國際貿易港市	087
楊宗霖 從番禺到廣州：嶺南地區早期發展之研究	121
劉石吉 從青龍鎮、十六鋪到小洋山： 上海港埠沿革發展史略	161
陳信雄 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角色與基本特性： 理解中國海外發展史的一把鑰匙	177
謝玉玲 浮槎仙鄉遇奇獸： 論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和《倚天屠龍記》的 海洋傳奇圖景	197
陳宗仁 明朝文獻中「雞籠」與「淡水」地名的出現及其背 景：兼論十六世紀下半葉北台海域情勢的轉變	225
范錦明 甘藷如何傳入台灣？	255
李其霖 清代臺灣的戰船	275
吳蕙芳 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 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	317
索引	353
作者簡介	357

消失的國界：

德萊克與前現代時期的海洋政治符碼

王儀君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跨洋探險成為當時歐洲各國擴展領域、發展經濟的首要任務。從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是歐洲各國海上霸權發展最快速的時期，文化史學者稱為的海盜時期，也是人類跨越大西洋經營黑奴販賣的時期。英國的海上冒險造就了德萊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羅利（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和庫克（James Cook 1728-1779）等航海家和提倡殖民的基爾伯特（Sir Humphrey Gilbert c. 1539-83）、海克路亞特（Richard Hakluyt 1552-1616）等人；順勢崛起的海盜有俗稱黑鬍子的愛德華·提區（Edward Teach 1680-1718）、喬治·布斯（George Booth 16??-1700）、喬治·勞特（George Lowther ?-1723），他們經常出沒的海域包括北海、地中海、加勒比海和印度洋；許多海盜不僅私下擁有武裝船隻，有的海盜得到政府認可，賦予特殊任務。海盜們除了在海上掠奪商船，有的甚至涉及奴隸買賣。在英國的伊莉莎白時代，身兼航海家、海盜和海戰英雄的大概以彼得·伊斯頓（Peter Easton 1570-1620）、德萊克與羅利最為著名。伊斯頓曾經奉伊莉莎白女皇之命保護紐芬蘭的漁船，羅利則曾經跨洋，企圖尋找位於中美洲庫斯科的黃金國（El Dorado）。德萊克則曾經去過美洲、非洲，也到過南洋的摩鹿加群島。歷史上的許多航海家和海盜都是帝國的擁護者，在眾多以海為職志的人物中以德萊克最具代表性。一方面，德萊克像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 1532-1595）一樣，是英國與西班牙海戰的英雄，卻也是

帝國黑暗面向中的梟雄。他雖然曾經投入販賣奴隸的行業，但仍然受命於女王，成為海軍中將參與西班牙的跨國戰役，打敗無敵艦隊，在帝國霸權興起的當下，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當時海上疆域的爭奪已經掩飾了帝國的傲慢和原有的疆界，而德萊克參與其中，不但印證了英國的海洋發展，也反映出英國殖民時期物質文化與精神文明的衝突。德萊克的航海生涯印證了英國的崛起，換言之，德萊克代表了十六世紀以降，在海上載浮載沉的奴隸船背後與帝國旗幟下的物質觀和不可避免的的道德沉淪，也定義了大航海時代的海洋政治。本文是以德萊克為核心，藉由他的地理認知與海洋經驗探討英國帝國擴張時期的帝國認同及海洋政治符碼。論文將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德萊克所涉及的航行紀錄，其二為族群詮釋和殖民競爭的海洋政治符碼。

一、跨界與國族建構

國族建構是大航海時代的最大特色，1600 年出版的《英國簡說》（*The State of England*）開宗明義敘述了英國國力的成長和海事的盛況：「曾經有二百四十艘船隻加入戰爭，四條商船同時出發，分別駛往黎凡特、巴布利等地，相信過去你不曾看過四英里寬的泰晤士河進出兩三百條船隻、多少人參加海戰，或是前往西印度群島。戰爭雖然停止，但是被取代的是英國人如何從敵人手中爭取獲利」（Wilson 36-37）。1488 年，葡萄牙人狄亞士（Bartholomeu Dias）越過好望角，1497 年出航的達迦瑪（Vasco da Gama）也越過好望角來到印度，並於 1502 年在印度成立葡萄牙的殖民地。和葡萄牙與西班牙相比，英國的海洋發展慢了一百年，但政治角力卻激發了航海和國族意識的發展，誠如哈立森（William Harrison）所說，「否則不同國家的敵人早已前來犯境」，¹英國的國族建構史於是見證了此一跨界時代的各種冒犯行為。

德萊克是大航海時代國族建構的代表，他在 1581 年被冊封為爵士，這位叱吒風雲航海家的事業主要是受到霍金斯爵士的啟

蒙。出生於 1542 年的德萊克正遭逢歐洲商業、軍事競爭的大航海時代，德萊克累積了些許經歷，在 1567 年 23 歲時，就追隨表兄約翰·霍金斯前往墨西哥聖煌·得·烏魯阿城(San Juan de Ulúa)尋求通商機會，不過因為西班牙勢力的介入，一場通商探路的首航演變成一場戰役，霍金斯爵士所帶領的水手及侍從傷亡大半，出航的六條船中，安然回航的只剩兩條，而且因為搭載量不足，許多船員甚至無法回航。² 之後的年代，德萊克踏著洛克(John Lok)、道爾森(William Towerson)和霍金斯的腳步，開始經營黑奴買賣的事業。當時的霍金斯最遠到達非洲西岸，以半買半強迫的方式將取得的非洲奴隸換取珍珠、獸皮和金子。不過，德萊克旋即在 1572 年，受命於伊莉莎白一世，指揮民間武裝船隻，航行至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區。和西班牙商船相遇時，德萊克多半劫掠西班牙人的物資，並且經常發生英國人與西班牙勢力範圍的爭奪戰。德萊克航行多次，足跡到達非洲、美洲、印度洋諸島，成為英國帝國擴張時期的代表，也是大航海時代英國殖民想像中最重要的人物。

德萊克的族群詮釋建構於英國當時的政治訴求，在伊莉莎白一世時期，西班牙與葡萄牙與英國競爭激烈，德萊克的航海事業也因而與這兩個國家產生許多利益糾葛。根據蒲瑞提(Francis Pretty)所記錄的《德萊克著名的世界之航》(*Sir Francis Drake's Famous Voyage Round the World*)，和德萊克同名的姪子依據牧師佛萊契爾(Francis Fletcher)所記錄的《德萊克世界之航》(*The World Encompassed by Sir Francis Drake*)，德萊克的世界之航是在 1577 年帶領五艘船隻從英國的樸利矛斯(Plymouth)出發。這次的出航被視為高度機密，連船員們都不知道航行的目的地。根據地理學家和英屬哥倫比亞古蹟維護官員巴維夫(Bawlf)的求證，德萊克此行的目的除了宣揚基督教的教義、驅逐兇悍的西班牙人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探勘從美洲西北邊殖民美洲的通路，並進而建立英國與東亞的關係(Bawlf 1-10)。巴維夫認為，德萊克曾經到達現在美國的加州、奧瑞岡州和加拿大的溫哥華；巴維夫對德

萊克的考證仍有再度求證的空間 (Gascoigne 2)，但是，無可否認，《德萊克著名的世界之航》呈現出德萊克建構英國殖民屬性的過程和疆域的想像。一般認為，德萊克除了建構自我，成為首位至極地的探險家，他的探險紀錄在百年以後才被庫克船長超越。後世的歷史學家雖未完全採信後世對於德萊克豐功偉業的描述，但是蒲瑞提文字中提到德萊克在探險領域中的主體地位和他們被美洲原住民視為天神的親身經驗的描述，卻足以呈現英國拓展殖民的文化記憶。

在大航海時代的英國，德萊克的世界之航最大的意義在於國界的跨越與航線的試探。疆域代表勢力範圍，而國界不但意味國家屬性，也代表主權行使的範圍，所以人類的歷史幾乎是人類的疆域爭奪史。歷史學者鮑德 (Michiel Baud) 認為，國界為政治所建構，國界也是疆域想像的投射。雖然地圖上的國界長久以來以欺騙虛假的面貌展現出政客、律師和一般知識分子對空間的內心圖像；事實上，無論國界劃得多麼清楚，無論邊界的瞭望台樹立了多少，所謂的邊界依然有相當的想像成分 (211)。國家的核心是權力的核心，國家的邊界是明確的界線，但是從古到今，總有許多人在邊界遊走 (Bustamante 485-90)，也總有許多國家將邊界推向自己所認定的處所。³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國界是十九世紀以後隨著國家領土、主權和領土上自然資源使用權認定所產生的概念；但是，國界的制定不僅與地圖的製作有關，也與國家機器劃分權力時所涉及的政客、商人、地主、官僚和製造業者相關 (Baud 216)。邊界開拓所使用的地圖一方面代表知識，另一方面代表擁有的欲望；為了穩固國界內的安定，為政者必須維繫外交、防備戰爭發生的可能，不免要將國家的精英妥善融入國家機器 (Baud 216)。然而，無論是諜報系統還是商業與政治擴張時所需要的精英分子，都可能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而替國家進行疆域探勘和尋求資源的精英分子也必須是貼近政權的人士。這些行動者以貿易、探險延展有形的國界，藉由戰役宣誓所認定的國界，甚至否定其他國家或族群所樹立的邊界。

德萊克的世界之航所使用的船隻名為金鹿號（The Golden Hind），在 1577 年出發，歷時三年返航，探險路程中折損的人員約為三分之二，可以想見前現代時期冒險旅途的艱辛和危險。疾病、武力衝突、天候和未能預測的傷害與冒險旅程中劫掠的獲利和發現可據為己有土地時的興奮有著天淵的差異。然而，冒險者藉由語言、文化與族群判讀他者，並且藉由親身體驗和空間、國族想像，建構了殖民歷史與傳奇，他們留下的紀錄也成為文化記憶。當時德萊克的第一站是北非巴布利海岸（Barbary）。二十五天的航程所消耗的食物需要補給。當地的居民慷慨地提供食物，而德萊克也以布匹及鞋子作為回報。德萊克一行人居住在巴布利地區的時日，發現了西班牙籍的漁夫在此地出沒，遂將西班牙人趕走，然後佔有西班牙人的輕帆船（23）。這個事件只是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爭端的一角，因為在此世界之航中，與德萊克發生衝突的對象相當固定，德萊克也似乎習慣以英國人的屬性作為行事的藍圖；德萊克在任何地點只要是能力所及，必定行使對其團隊有利的決定，不僅將所在地作為行使職權的場所，而且逐漸散播反西班牙情緒，將西班牙建構為異己。

德萊克尋求美洲的據點以避開西班牙人為主要的訴求。根據蒲瑞提在六月五日的敘述，他們將船停靠加州海岸，當地的原住民隨即送上禮物，並且對德萊克一行人所攜帶的物品顯現好奇的心態。這些男性的原住民赤身露體，女性則用鹿皮披在肩膀，蘆葦遮掩臀部，女性對配偶相當順從（Pretty 8）。原住民對德萊克敬獻的禮物包括菸草和獸骨製成的項鍊，德萊克則代表英國女王伊莉莎白接受饋贈。原住民的儀典是歌舞、演講和哭泣，不同的場合則有不同的表達情感方式。當原住民和德萊克一行人進行溝通的時候，有些人拉扯自己的頭髮，有些人哭泣，也有的人用指甲抓傷自己的臉皮，鮮血直流（Pretty 8-10）；德萊克的儀典包括教導原住民控制自己的情緒、基督教禱告的方式（Pretty 10）和遮蔽身體的「禮節」，最後德萊克又將英國刻有伊莉莎白名字的錢幣釘入木樁，以豎立地標（Pretty 9），並以新英國（New Albion）

為這些原住民的土地命名 (Drake 123-32)。蒲瑞提最後在文中以簡潔的筆觸寫道，木樁上刻著某年某月某日，此省與土地上的人民都交付給英國女王伊莉莎白 (Pretty 9)。蒲瑞提不但記述船員解說他們並非天神，但原住民們並不相信，蒲瑞提更加上了自己的結論：「似乎西班牙人還沒有發現這個地方，也沒有來過這片土地以南的區域」 (Pretty 9)。從文章顯示，蒲瑞提的喜悅溢於言表，他所提到的地理「發現」儼然成為一種能夠增加能量與財富的「知識」，將屬於原住民的土地據為己有也成為理所當然之事。默立森 (Samuel Eliot Morison) 就曾經在其經典《歐洲人發現美洲大陸 1492-1616 史料》(*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1492-1616*) 評論，基督教在美洲傳布甚廣，原因可能來自原住民生活環境惡劣，求救無門，才將未來寄託於外來的基督教，誤信歐洲殖民者是神的使者。根據默立森的研究，在 1615 年前，中美洲許多基督教教堂就已經執行彌撒的儀式 (1-10)。格林布萊特 (Greenblatt) 也在其編著的《遇見新世界》(*New World Encounters*) 中強調，跨海而來的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其實是文化的大發現，因為美洲原住民的文化已經被歐洲人一覽無遺，並被稱為粗魯、天真、可憐和容易被欺騙的族群 (viii)。格林布萊特的評論似乎強調了美洲原住民是歐洲文化衝擊下的受害者，隨著航線前來的後期殖民者更帶來了統治的方法。德萊克對這趟旅程和新發現的地方相當滿意，隨船的牧師還記錄了他們登船前往摩鹿加群島 (Molucca) 前，英國剛「收服」的原住民「子民」流淚哭泣的樣子 (Hodgings 431)，並使用殖民者一廂情願的「命名政治」 (politics of naming)，詮釋「佔有」為殖民應有的歷程。

在探勘美洲之後，德萊克又將船隻駛向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香料群島。蒲瑞提所描述的航程其實結合了探險、掠取、爭奪地盤與國族身分的建構，但是，航海競爭下之國族建構方式涉及殖民母國和自身的利益，因此航程中充滿暴力。舉例來說，在智利海岸，德萊克為了「給西班牙人一個警告」 (Pretty 6)，仗著對方勢力單薄，夾擊其中的一個西班牙人，又將其他的幾個關進工寮，

剩下的一位倉皇跳海逃逸；德萊克一行人就在掠奪船上的西班牙錢幣後，來到鄰近小鎮。小鎮不過九家民宅、一間倉庫和一座小禮拜堂，小鎮的西班牙人紛紛走避，德萊克一行人就搬走了倉庫裡的酒，燒了杉木取暖，然後押了一個希臘人上船，前往利馬（Lima）的港口。到了亞立卡（Arica），免不了又是劫掠，所得是五十七捆銀條，每捆就有二十磅（6）。德萊克的劫掠西部商船有時相當戲劇化，他們的船隻還會跟著一些商船，見機劫掠，掠奪的貨物還包括布匹和絲織品。在一次的掠奪中，德萊克說，船長前輩，你有兩只銀杯，但是我就是需要其中的一只（7）。而蒲瑞提也會偶爾提出自己的見解，覺得像他們這樣替國人報仇，一定會受到英國女王的賞賜（7）。

在蒲瑞提的眼中，德萊克是個具有人道精神又和善有禮的長官（7），所有的船員都願意服從他。德萊克到達了香料群島的提那達（Ternate）和提多島（Tidore）後，建立了雙方的友誼，也熟悉了這些以回教為信仰的蘇丹王的習性，接觸了當地的礦產、水果和香料（12）。在蒲瑞提筆下的蘇丹王還善意告知外海有葡萄牙人的船隻出沒，因此他們低調地繞過好望角經過美洲，返回英國。蒲瑞提和德萊克姪子所作的紀錄都涵蓋德萊克的船員和西班牙人的爭端。受命上岸取飲用水的船員慘遭殺害，但對方有騎兵三百、步兵兩百，德萊克一行人便等到西班牙軍隊離開才能上岸掩埋死去的事實，呈現出殖民時期爭奪屬地已逐漸白熱化，但是海上情勢愈惡劣，海洋上霸權的開展就愈重要；尤其是十六世紀時，英國、法國、荷蘭商人對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海上貿易極度不滿，卻又無法獲得政府的協助，因此鋌而走險，轉而贊助武裝民間船隻。克拉克（Samuel Clarke）曾經描述有一次德萊克出航劫掠了約五萬枚金幣，手下們高興地分得獲利的情形（62）。雖然德萊克經常向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獻上珍貴寶石作為禮物，但事實上，德萊克卻也受到商人的責難，指控德萊克未能將真正的獲利公開，讓支援武裝民船的商人受到損失（Hopper 45）。不過，德萊克以海盜身分躍為英國炙手可熱的人

物有歷史的因素。其一，英國與西班牙因新教與天主教的差異和經濟競爭積怨已久；其二，英國懷疑西班牙涉及顛覆伊莉莎白一世的政權。當時伊莉莎白的英國海軍實力不及西班牙，但菲利普二世（1527-1598）雖與伊莉莎白一世同父異母的姊姊瑪莉女王（Mary）在西元 1554 年結婚，瑪莉於 1558 年去世，英國的宗教改革依然持續，但菲利普二世在 1588 年成立無敵艦隊，想要進軍英國。英國方面為了節省支出，調度武裝民船和民兵是一貫策略，但戰事爆發，伊莉莎白的主帥仍是賀渥德（Lord Howard），仰賴霍金斯及德萊克的武裝船隻與海戰戰略，贏得勝利（23）。德萊克最後的旅程是奉命前往巴拿馬，替英國阻擋西班牙的商船。然而，德萊克在誤判波多黎各地區西班牙的勢力時，感染疾病死在海上。

二、海洋政治

地理政治（geopolitik）是文化研究興起以後重新引發重視的學術理論，二十世紀德意志帝國發展帝國主義也曾經運用此一理論為基礎，來發展帝國主義營運策略。這個學派的理論可以追溯至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更早的自然科學家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地理學家瑞特（Karl Ritter 1779-1859）對疆域的看法。瑞特的地理學的重點，擴大了傳統的地理學，進一步討論地理、人文與物質的關係，這個「居住空間」（lebensraum）的理論被後來的納粹主義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引申為擴大國家疆域的策略。換言之，為了生存、為了經濟利益，國家版圖擴張時，即使犧牲別的國家也在所不惜（Hitler 1-23）。海洋政治是地理政治的延伸，海洋政治涉及海權、跨國經濟策略、國際海洋秩序的建立和海洋國家的發展等。美國軍事學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提出《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強調海權的重要。他認為，雖然海上危機四伏，但是海洋就如同海上